

世界主义批判

陈众议

近来,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强调话语体系建设的同时,世界主义在文学及其他场域再度升温,并被誉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最重要的文化思潮,即“‘大破’之后的‘大立’”。它与跨国资本的全球发散有关,但间或伴有狭义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某些一厢情愿。当然,也不排除别有用心者借此复制“皇帝的新装”;他们有意将歌德式的世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空想与科学的界限。

世界主义是个老话题

世界主义由来已久,且从来内涵模糊、外延不清。首先,它与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一脉相承;其次,它业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残酷的现实,即去民族化的“国际化”趋势;再次,它的消费主义取向违背了经典的伟大传统,包括旨在改良民族性、国民性和人情世故、时流世风的批判传统。

世界主义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和古希腊时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孔子同时用“礼崩乐坏”谓其世道。同理,柏拉图从“爱知”的角度阐释过富有大同精神的理想主义,而三大悲剧家正一味地追怀英雄传说时代。至于第欧根尼,则是西方第一个用行为艺术践行了世界主义的“犬儒主义者”。他时而以世界公民自诩,竭力宣扬友爱;时而,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并像印度托钵僧或浮浪者那样四处飘流。如今,这友爱不仅指向人类,而且兼及动物和整个自然,是谓后人道主义。

与此同时,世界在倾轧和反倾轧中飘摇、燃烧,再飘摇、再燃烧,没完没了。一晃过去了许多时光,直至“现代宗教”脱颖而出,化生为形式相左、本质一致的精神慰藉(马克思则称之为鸦片):一方面,纯爱主义、博爱思想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宗教迫害和宗派争斗愈演愈烈。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理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无限自由的“整体论”概念。在他看来,“无限”不仅仅是思想,而且也是现实。世界万物皆有“自己”,有了“自己”的始终。这是《判断力批判》的“整体论”思想。在这个只有人(或智者)才能发现和判断的“整体”中,一切皆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能仅仅归结为机械的“因果”关系,而且也是“自由”关系。它类似于“万物静观皆自得”(程颢)思想,即人本“自得”,并在“自由一和谐”的关系之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生相克”、“相克相生”。这里还有老庄的影子。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普世价值”被进一步确定下来,以至于圣西门认为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思想和思想者,而不是别的。圣西门声称,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让人类的绝大多数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他们必须认识最适合于社会的组织体系,并促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采纳和完善这种体系;而当它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时,再将它取缔,并利用各方面的专家“建立新的体系”。这种观点多少回响着柏拉图的声音,同时又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一次变易,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参照。

马克思主义的大同观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相信脱离实际的理论。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他同时指出,

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经济根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盖因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不是日常生活中、一般意义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或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简而言之，世界观、历史观使然，马克思主义的大同观是建立在全球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共产共享。

退一步说，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即使你出于善意与人求同，人家不容奈若何？关于后者，美国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和所作所为当可说明一二。此外，国人中又委实不乏理想主义者，他们从主观意愿出发，单相思般拥抱“世界”。而这个“世界”说穿了是美国和西方。于是，悖论出现了：一些堂而皇之地视民族情感为犬儒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开始身体力行——放弃国籍，殊不知改变国籍并不能说明他（她）就摇身成了“世界公民”；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他（她）移情别恋、不屑于做中国人了，仅此而已。于是，我们或可拿新老华侨作个简单类比。一方面，作为苦力（“猪猡”）被迫离乡背井的老华侨们曾经多么心心念念怀揣祖国；而某些不屑于做中国人的新华侨，原因固不相同，却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怀想（个别裸官裸富更不必说）。曾几何时，即使国力不济、饱受屈辱，一代代华侨仍心系祖国，故而落叶归根、祖国强盛是他们最大的祈望。不说更远，想想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吧，再想想那些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倾囊相助的华侨（已经不是华人的华人）！再说，即使在那个最不逮、最不堪的年代，《黄祸》之类的作品从出于华人华侨之手也是难以想象的。后者接续了源远流长的“黄祸论”，其“仇内”心理（以其立场观，与其说是仇内，毋宁说是仇外）不言而喻。当然，这是以偏赅全的一种说法，并不指向所有新老华侨。

同时，有一股思潮正甚嚣尘上，其核心指涉在于认为中文（一曰方块汉字）像一个猪圈，圈住了国人的思维和想象。这种谬论固不新鲜，然沉渣泛起却大有因由。先说它如何不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间或其后就有人宣扬过“中文之害”，其中钱玄同先生是这样说的：中国欲得新生，必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当时此话不孤，响应者不寥。但时至今日，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方块字无论在输入速率还是思想、感知、审美维度等方面均不逊于拼音文字之际，又如何掀起废黜浪潮了呢，岂不怪哉？但怪也不怪，正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而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历史的载体和介质，“废黜中文”论本质上不外乎世界主义的一个和声。究其原因，一是民族虚无主义，二是快餐文化和消费主义。二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

在此，我们不能不感佩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马尔库塞对“全球化”的预见和洞识。后者在《单向度人》等著述中一改西方学界的大众社会批判，将矛头直接指向消费主义和无产阶级自身，谓基于资本贪婪和资本家市场策略的消费主义使无产阶级逐渐丧失了传统工人阶级的纯粹性和阶级属性，并使之混同于中产阶级。于是，购房、还贷、旅游、享受和超前消费成了他们的重要追求和生活方式。知识分子亦然。联想到后工业时代金融泡沫（通过股票、证券等）如何不分阶级、不论阶层地吸纳资金，及至人人成为“债权人和债务人”，我们自当有所思量。

可疑的“世界文学”

然而，正是在“大同”、“博爱”等泛世界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世界文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由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歌德最先提出，歌德在浏览了《好速传》等东方文学作品、亲历了欧洲文学的“相互作用”之后，于1827年宣告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并呼吁大家为此努力，谓从此往后“民族文学已不重要”。此后，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在《世界文学》一文中将人类因相似的社会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文学规律泛化为“世界文学”，认为“这种过程可以在希伯来和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学中观察到”。同时，丹麦学者勃兰兑特从文学的翻译、流播看到了“世界文学”，“马洛、柯尔律治或雨果、左拉、易卜生等众多作家均不仅属于自己的国家”。泰戈尔则认为伟大的文学没有国界，而“世界文学”乃是具有世界意识的作家合力构建

的：“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目标：摆脱肤浅狭隘，在世界文学中探求普遍的人性”。同样，郑振铎先生视文学为人类精神与情感的反映，而人性具有共通性，因此人类的文学也具有一致性，即“统一观”。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是建立在对资本从地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批判性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它是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形态)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建立，“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也是事实。但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提是资本对民族性的消解；而且在这个“世界文学”格局中，各民族和地方文学的地位并不平等。问题是，许多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马克思恩格斯言说“世界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和辩证方法，从而错误地将其归入文学“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的倡导者之列。

如此，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情感“共舞”和精神“狂欢”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有少数人对此持审慎态度，甚至提醒共存和交流的背后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单一性。归类并包，持前一种观点的有卡萨诺瓦、德里达、拉康、福柯、克里斯蒂娃、莫莱蒂、邓宁、米勒、达姆罗什、贝克以及一些不经意融入后现代狂欢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如萨义德、斯皮瓦克、福山、巴巴，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展)。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杰姆逊、伊格尔顿、佛克马，以及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如阿普特、韦努蒂等。持中间立场的则有奥尔巴赫、费斯克，等等。

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市场已然形成，资本对文学的主导地位也已初露端倪。村上春树、阿特伍德、波拉尼奥、赛阿维达以及丹·布朗等(这个名单亦可无限延续)东西方作家的国际化、“全球化”取向和市场份额有目共睹。因此，村上战胜大江、阿特伍德战胜门罗、郭敬明战胜莫言在市场的天平上毫无悬念。

此外，所谓的“世界文学”本质上不外乎欧美文学或极少数为欧美所认可的亚非拉作家作品。而我们，甚至不清楚周边国家文坛都有些什么，何谈“世界文学”？当然，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是另一回事，老挝有文学，柬埔寨有文学，缅甸也有文学，但世界市场和时流风尚有所偏侧，古来如此。

“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

然而，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什么可以幸免资本的影响，文学也是如此，甚至首当其冲。这就牵涉到“全球化”(本质上即跨国资本主义化)时代的伪多元问题。

首先，“全球化”远非世界大同。恰恰相反，我们面前的世界很不太平，我们面对的话语也很不公平。简而言之，世界充斥着来自西方的话语霸权(它铺天盖地，对我国的意识形态以强烈的挤压)。同时，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相伴而生。因此，强调民族利益不仅需要，而且紧迫。在民族、国家利益这个最大公约数中，思想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有了讨论的前提和可能。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倘使我们对“经济全球化”之类带有欺骗性的“中性”话语尚未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必然会自我撕裂，做糊涂虫、犯幼稚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能割裂吗？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之道，又利用资本主义之器？马克思不认为这世界有什么纯粹的公器，事实也是如此。存在与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从来都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彼此促进，又彼此斗争、交错递进、螺旋发展的。既然无法割裂，那么我们又如何平衡道器？于是，小平说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一节中预言过今天：资本在完成了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以后走向国际垄断。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自由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不可能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盖因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于一国或几国的资源和市场。它们当然要消解各国主权，以致其剥夺在全世界畅通无阻。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他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的深刻洞识预见到了这一点，并说各国人民将“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不正是我们面

前的“全球化”吗?

再次,“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它仅仅是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符合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和辩证法的解构风潮在否定简单二元对立和排中律的同时夸大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相对性。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使得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并且客观上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去民族化”态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熟谙同时代及其之前的西方文学。他们固然都没有专门从事文学批评,却因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一是针对巴尔扎克,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胜利的观点,二是针对莎士比亚和席勒,提出了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的观点。二者既申明了立场,又在方法论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不是吗?世界文明一路走来,明显呈现出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由强到弱、由宽到窄、由大到小的历史轨迹。于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技术理性畅行无阻;道器从未如此颠倒,世界也从未如此令人不安。这也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反对个人主义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需要,也是经典作家为我们指明一条屡试不爽的成功之路。而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的胜利多少蕴涵着对世俗、对时流的明确背反。而莎士比亚除了内容的丰富、情节的生动,其针对拉伯雷式的狂欢所取法的索福克勒斯式的警醒同样充满了背反精神。

现实永远比理论更有说服力

如今的所谓世界主义则将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这显然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对于发展中国家非特无益,反而有害。且不说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如何沦为灾难,即使以素有美国后院之称的拉丁美洲为例,也何啻触目惊心。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左翼作家、国际和平奖获得者约瑟·德·卡斯特罗就曾大声疾呼:在近三亿拉丁美洲人口中,有近五千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近一亿为文盲。半数人口生活在拥挤不堪、脏不可耐的贫民窟。按人口计,拉丁美洲生产的粮食远远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按不变价计,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来,人均出口减少了三倍。然而,“在那些外国主子及其代理人——资产阶级看来,目前的制度非常合理。我们的资产阶级将灵魂卖给了魔鬼,其廉价程度则足以令浮士德感到愤慨”。上世纪8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以更加有力的证据谴责世界的不公:当欧洲人正在为一只死鸟或一棵死树如丧考妣的时候,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十年间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一夜之间全部蒸发。1979年以来,中美洲内战频仍,几乎每分钟就有一人被迫逃难,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加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北欧国家。上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在债务危机的重创下哀鸿遍野。拉丁美洲的外债达到数万亿美元,不少国家因无法偿还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利息而陷入危机。这一定程度上与此时此刻的欧债危机不无相似之处。但拉丁美洲毕竟不是欧洲,其经济基础显然更为薄弱;列强对她的态度也远不及我们今日之所见,譬如它们对北欧和南欧诸国的宽容与帮助。二拉丁美洲仍在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付出高昂的代价。当然,这是最为简单的一种说法。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同前述世界主义怀想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同一条路。至于古来“世界”、“全球”或者“天下”之类的词汇,主要是空间地理概念,与目下的世界主义思潮并无多大瓜葛。而最早明确启用世界主义(Cos-mopolismo)这个概念的是墨西哥文人巴斯康塞罗斯(《宇宙种族》,1925)。但他迅速遭到了拉美本土主义者,尤其是左翼作家的批判。后者批评巴斯康塞罗斯的世界主义或宇宙主义是掩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神话。“宇宙种族”只是有关人口构成的一种说法,并不能真正解释墨西哥及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雷布埃尔特斯坚信民族性即阶级性,因而并非一成不变。“面对难以调和的种族压迫、民族矛盾、阶级斗争,何谈‘宇宙种族’”?这岂不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争如出一辙?

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

至于后现代诸公，无论初衷如何，其结果大抵像火又像水：在焚烧一切的同时也烧掉了自己；或者“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滔”。当然，必须承认，被其解构的二元论有时确实极易滑向排中律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同时，人类也确有一些超阶级的普遍价值存在，譬如母爱，譬如乡情、爱情、友情，等等。这些情感又必须从小出发，然后逐渐放大，而非相反。一个连亲、师、友都不爱不敬的人，又怎么爱君、爱国、爱世界？由己及人、以己度人，即孔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归根结底，爱己与爱人、爱家与爱国、爱家国与爱世界即理论上或并不构成矛盾，现实世界中却利益纠葛所在皆是，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也是利益冲突，“利益是唯一的推动力”。因此孔子之谓及诸如此类的美好愿景，不外乎美好的愿景而已。盖因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自由走向禁锢(或禁忌)，再走向自由(高度自觉)的过程，而非相反。因此，此自由非彼自由。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是禁律约束本能，譬如早在西周初期，我国就建立了严格的婚姻禁忌，禁止同姓(兄妹)联姻；高级阶段是自觉代替禁律，及至真善美战胜假恶丑，最终达到自由王国。然而，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王国尚未终结，理想的自由王国还很遥远。国家之间的倾轧与反倾轧从未停止，恐怖主义仍十分猖獗，陶冶人心、凝聚人心、励志向上的文艺作品依然是落后民族和平崛起、与发达民族国家共享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因此，在看得见的今天和明天，世界主义依然只是文人的美好怀想和一厢情愿。

总之，建构话语体系关键在立场。而国家利益无疑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它针对跨国资本主义而言，与上世纪 20 年代的国家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它所取法的是基本的民族立场，并借此强调对于中华民族还至为重要的民族向心力和认同感。当然，在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还十分遥远，而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依然强大的这个时代，必须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并且知己知彼、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理解和赞同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崛起的基本诉求，并对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艰巨性有足够的心理准备。